

公民身份与 经济增长

包容性公民法往往能促进经济发展

帕特里克·埃米尔·伊玛目、康尼·波达尔



公民身份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历史上，忠诚的对象通常是一个民族或封建领主。随着 19 世纪单一民族国家的诞生，人们需要区分属于和不属于国家的人，从而在本国公民和外国公民之间建立了法律上的区别。大多数国家在那时或在独立时建立了“国籍规则”，其基本原则至今仍保持完整。在大多数情况下，此规则定义了谁是国民，以及如何获得公民身份。公民受益于投票、在国内自由流动的能力以及工作资格等权利。他们也有责任，如在军队服役、纳税和投票。

现代公民身份的概念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个观点基于人权宣言，具有包容性，可以



将国籍扩展到满足某些条件的任何人。另一种观点更具排他性，将一个国家定义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具体来说，

- 包容性的观点反映在出生地法(属地主义, jus soli)中,即在一个国家领土内出生的人自动获得该国国籍。在这种的观点(通常新大陆采用这种观点)中,公民身份的纽带超越了血缘关系,而且包含了不同基因和地理背景的人。这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体系提供了基础,该体系可以确保新移民及其子女被接纳并轻松获得公民身份。

- 血统法(属人主义, jus sanguinis)具有排他性,子女的国籍跟随父母的国籍,无论其出生地点。亚洲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以及非洲部分地区的情况通常都是如此。这种形式的公民身份更以民族为中心,而且从定义上来说包容性较差:公民身份的定义部分源自将非公民排除在基本权利和特权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世代代生活在一个国家,但却不是本国公民。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采用融合了这两种原则的公民法。虽然各国最初通常采用出生地法或血统法,但许多国家最近改变了其政策,转向另一种观点。1999年,德国对其基于血统法的公民法进行了重大改革,使居住在德国多年的外国人,特别是在德国出生的外籍人士的子女获得德国公民身份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英国等国收紧了出生地法,不会自动给予在其国土上出生的人公民身份。下页的图展示了世界各地公民法的分布情况。

按地区划分的公民身份

在欧洲大陆,出生地法在历史上一直占主导地位,反映了封建传统将人们与他们的出生所在地的领主联系在一起(Bertocchi and Strozzi,

2010)。大多数欧洲国家在19世纪根据这种模式起草了公民法。日本也是如此,以欧洲大陆的宪法为蓝本制定了本国宪法。

法国是个例外。法国大革命打破了这种封建联系,血统法占据上风。19世纪末,法国在与普鲁士的战争中战败后恢复了出生地法以增加本国人口,并将外国社区融入进来,这一举措将有助于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然而,英国人在国内和整个大英帝国都保持了出生地法。

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制度薄弱的国家,公民法很重要。

美国等国家选择了出生地法,对于移民国家而言,这是意料之中的。为了保护黑人奴隶的基本人权这一特定目标,1868年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确立了出生地法。美国公民身份相较于美国居民的利益有限也意味着为新移民提供公民身份的财政成本有限,以及新增额外工人的潜在好处。这个主题不仅仅与美国相关,值得单独进行考虑(教育成本由移民的母国承担;参见 Bertocchi and Strozzi, 2010)。同样地,人口稀少的大国加拿大以出生地公民法来吸引移民。

在殖民地国家,其公民身份法一般最初是从殖民政权继承而来的(Bertocchi and Strozzi, 2010)。具有强烈民族认同感的国家,如中国、埃及和日本,通常难以获得该国的国籍或第二本护照。其他国家,特别是较新的西半球国家,加入该国国籍通常更加容易。

许多前英国、法国和葡萄牙殖民地非洲国家缺乏民族凝聚力,在独立时对公民法进行了修改:大多数前法国殖民地最初都沿用出生地法;

世界各地的公民法

西半球国家传统上遵循出生地法，而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血统法占主导地位。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采用两者融合的方式。



出于种族因素的考虑，前英国和葡萄牙殖民地倾向于转向血统法。由于许多国家是在不考虑当地民族多样性的情况下人为组建的，导致政治不稳定，因此血统法被认为可以巩固民族认同感。

塞拉利昂就是这种情况。1961年，宪法将公民身份限制为只能通过血统传递，而且仅限于那些有非洲黑人父亲和祖父的人。但是在一个被迫迁徙的异质民族环境中，法律将各种民族和部落群体排除在外，造成疏离和冲突，特别是在制度薄弱的环境下。例如，1964年的刚果宪法为了排斥卢旺达移民，只承认其父母是1908年以前在该领土内建立的部落群体成员的人为公民（见 Bertocchi and Strozzi, 2010）。不出所料，其后果是造成部分群体的边缘化，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产生无国籍人士，他们之后可能会造反。

不同的影响

公民权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数据生动地阐述了采用出生地法的国家与采用非出生地法的发展

中经济体之间平均人均实际 GDP 的显著差异。2014年，前者的人均收入比后者高出80%。从样本中分类出采用非出生地法国家与血统法国家，结果证实那些采用出生地法的国家更为富有，但在比较采用混合制度与血统法国家时，则没有发现明确的模式。

为什么产生这样的差异呢？公民法可以被视为解决冲突或生成冲突的制度。若公民法具备包容性，则可以提供积极的社会资本，增强信任，缩减交易成本并降低冲突的可能性和强度。在其他解决冲突的制度缺乏有效性时（例如，政府腐败或法院薄弱）尤其如此，就像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那样。原则上，血统法使融合变得更加困难，从而损害了经济发展。

它可以通过若干渠道影响经济：

扭曲（和减少）投资：缺乏获得公民身份前景的投资者更短视，他们会留心过度暴露风险于单一国家，并且在选举期间变得谨慎——在制度薄弱的国家里他们尤其脆弱。此外，他们的投资



也是扭曲的。如果人们的财产权因其缺乏当地公民身份而得不到很好的保护，那么投资重心将放在回报快或者所需资本金有限的领域。例如，在柬埔寨和马达加斯加，外国人可能不会购买限制投资的土地。

政治不稳定和腐败：没有公民身份的少数群体往往处于两种极端——要么被排除在经济活动之外，要么在当地经济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没有公民身份，边缘群体不能通过民主手段进行投票或影响公共生活。被剥夺公民权的群体通过抗议或暴力等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这可能会刺激政府压制这些少数群体，也许会增加军费开支，从而削弱经济增长。相反，当一个非本国的集团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时，其缺乏国家保护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由于他们的脆弱性，有影响力的少数群体有动机去影响政治进程并可能诉诸贿赂，从而助长了腐败，削弱了制度。

降低公共部门效率：相关研究已经记录了种族、宗教或语言方面的分歧如何经常破坏公共部门的绩效，增加赞助，降低民众的信任，最终损害经济发展（见 Easterly and Levine, 1997）。

扭曲劳动力市场：根据血统法，当地非公民少数族裔可能被排除在部分劳动力市场之外。在许多国家，移民被禁止从事全部职业。例如，在泰国，外国人不能成为理发师或会计师。在法国，欧盟以外的人不得成为殡葬公司的董事。在这些情况下，出生地法能够扩大血统法无法实现的劳动力市场，拓宽劳动力资源并提高经济效率。

我们的实证结果证明，即使控制了潜在的内部因素，公民法的差异也会影响经济发展。我们首先编制了一套新的公民法数据集，然后测算公民法是否可以部分解释各国人均收入的显著差异。我们发现，在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在制度薄弱的经济体，公民法很重要：出生地法在本质上更具包容性，鼓励同化和融合，对收入水平具

有重要的统计学意义和正面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2014年改用血统法的国家的人均收入要比保留自独立后的出生地法的情况低约46%。此外，我们的研究发现，在采用血统法的国家，通过婚姻和入籍的方式获得公民身份较为容易，从而缩小了与采用出生地法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这表明在获取公民身份的道路上存在一些可替代性。

增进融合与促进增长

关于公民法的争论在过去几年中愈演愈烈，不仅在发达经济体，在发展中经济体也是这样。我们证明了这些法律对低收入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更为实质性的影响，部分原因是它们的制度更为薄弱且不一定能抵消具有排他性的公民法的负面影响。

政策影响虽然存在细微的差别，但影响明显。在发展中经济体越来越多地输送移民和接收移民的时代，有效整合这些人口可以刺激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前殖民地国家，血统法已经损害了发展。在其他条件都相等的情况下，从血统法转变为出生地法可能会增进融合并促进经济增长。

帕特里克·埃米尔·伊玛目 (PATRICK AMIR IMAM) 是 IMF 驻津巴布韦的代表。康尼·波达尔 (KANGNI KPODAR) 是 IMF 战略、政策和审查部的副处长，同时也是位于法国克莱蒙费朗的国际发展研究基金会 (Foundation for Studies and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的高级研究员。

参考文献：

Bertocchi, Graziella, and Chiara Strozzi. 2010. "The Evolution of Citizenship: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53:95–136.

Easterly, William, and Ross Levine. 1997. "Africa's Growth Tragedy: Policies and Ethnic Divis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1203–50.

Imam, Patrick A., and Kangni Kpodar. 2019. "Does an Inclusive Citizenship Law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IMF Working Paper 19/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